

反叛与激进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述评

余永跃 秦丽萍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伴随着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出现,基于对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男女平权成色不足的反叛和对女性受压迫根源的反思,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转向更具非理性与革命性的激进观点与行动。这固然使得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声名鹊起,但争议也相伴而生。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自产生以来就是颇具争议的西方女权主义流派,而其本质主义的主张与行动也招致人们对它的成见与日俱增。这就需要对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与行动予以科学分析,以求为妇女解放运动带来启示。

关键词: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父权制;性别批判;生物革命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1-0015-06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素以其观念与行动的激进性而著称,堪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的一派。正因为它具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和明确的态度,它向来被认为是人们认识西方女权主义的最直接的入口。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甚至被人们冠以“女权主义的代言人”,而其观点与行为则顺理成章地被等同于所有西方女权主义的观点与行为。毋庸置疑,人们对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这无疑构成了人们对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以及西方女权主义的重重误解。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虽然很重要,也发挥了不容否定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子集而已。

一、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

“Radical Feminism”在国内一般被译为“激进女权主义”或“基进女权主义”,这源于“radical”一词具有的双重含义:其一,再现了这一派的思想 and 行为都较为鲜明、大胆、偏激和革命;其二,“radical”一词含有拉丁语“root”(根),此处为形容词的用法,即含有“根本”之意,意指只有从“根本”上整治,斩草除根,才能改变女性千百年来受压迫的状况,从而缔造革命的真正的转变。

作为发端较早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发展成为席卷欧美各国的较为系统的自我认定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比较激进的年代,

收稿日期:2016-12-01

作者简介:余永跃(1967—),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妇女理论研究会理事,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研究基地研究员,武汉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文明建设与女性发展研究;秦丽萍(1987—),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研究。

正值欧美政治动荡达到高潮之际,反传统、反文化、反客观、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颇为流行,与法国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运动和抗议越战运动相伴而生的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理论是由“新左派”运动中男性激进分子对待女性的傲慢无礼激发的。“先进的”激进分子的态度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代表新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年轻女性深切意识到她们自身的真实处境。这种情况使得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决心要让她们自己的“特殊”问题和新左派运动所关注的社会公正与和平问题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合法性。在参与运动和理论反思中,她们逐渐意识到,大男子主义和女性的屈从地位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因此,她们主张女权主义必须成为一切真正变革的基础,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流派中锋芒毕露的一支,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它对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颇有微辞,“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走得不够远”^[1],于是它便在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反叛中走向激进。在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不仅立场和要求过于温和了,而且思想和价值观仍然处于男人确立的框架之内。一方面,它认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虽然帮助女性获得了“平等”参与社会的“入场券”,但是后者所谓的“平等”仍是以男性为标准的,即使女性能够取得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成功,这种成功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另一方面,它以为国家及其附属机构并非性别政治的中心议题,国家只不过是男权压迫的工具,必须突破已经建立的政治传统。这一派女权主义部分的是为了解决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因此,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实践要求与理论主张通过一些独立的妇女、女性团体或组织等的宣言和成员的文章表达出来,起初以纽约和波士顿两地的“妇女运动”为代表,后来她们参与了当时席卷全美国的多场激进社会运动。

二、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基本特征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已经形成自己的基本见解。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1970)、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为男女平权辩护》(1970)、杰曼·格里尔的《女阉人》(1970)、盖尔·卢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宣言、演讲和论文集发表。此后,重要新作迭出,如玛丽·戴利的《天父之外:通向妇女解放的哲学》(1973)和《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1978)、安德里亚·德沃金的《右翼妇女》(1983)、德尔菲的《主要的敌人:女性压迫的唯物主义分析》(1980)、德尔·史班德的《男人创造语言》(1980)、奥布赖恩的《生育的政治》(1981)、科里尔的《生育机:从人工授精到人工孕育的再生产技术》(1985)、麦金农的《义无反顾的女权主义》(1987)、考斯克的《静默的情感: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1984)和《对立的想象》(1989)、沃尔比的《男权制理论研究》(1990)等等。相较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是一个几乎全新的思想体系。它非常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完全由女性创造出来的理论,又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并宣称自己的独特理论“完全没有父权制的痕迹”^[2]。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试图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聚焦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

(一)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

1. 聚焦妇女的共同经验,创立父权制理论。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几乎是开拓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它否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缺少政治和公民权利的观点,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的观点”^[3]。它率先提出将妇女的共同经验作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并且还对其他理论范式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提出质疑,要求对政治领域重新进行界定。她们声称“妇女在历史上是第一个受到压迫的群体;妇女的受压迫是分布

最广泛的压迫,这种压迫在迄今所知的每一个社会里都实际存在着;妇女受压迫最深,这一压迫是最难以铲除的压迫形式,诸如废除阶级社会这些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并不能根除压迫妇女的形式;对妇女的压迫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痛苦,尽管这种痛苦常常没有被认识到;这是因为性别歧视的偏见存在于压迫者和受害者双方的头脑里;妇女的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的压迫形式提供了概念模式。”^[4]

为了使得这一系列的主张更有说服力,她们借用人类学家的“父权制”概念创制了父权制理论,以此来解释妇女的受压迫境况。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首次系统地把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展开论述,她对“父权制”进行了新的解释,并赋予其政治理论分析上的中心地位。从字面来看,父权制就是由父亲实施的统治,也指一种在家庭内部丈夫或父亲居于支配地位而妻子和孩子居于从属地位的现象。因此,父权制的用法意味着,整个社会中的男性权力体系既反映了家庭中的父亲统治,也根源于这种统治。这一点在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口号中得到了印证“涉及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它揭示出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之下,在各种亲密的关系中,权力无所不在。它明确地向公私分离的传统观念挑战,为开创一个以传统私人领域为斗争中心的政治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米利特指出:“如果我们将男权制的政府看作由占人口一半的男人向占人口另一半的女人实施支配的制度的话,男权制的原则就是双重的:男人有权支配女人,年长的有权支配年少的。”^[5]这就意味着父权制社会是以性别压迫与代际压迫的连锁体系为特征的。

除了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之外,格里尔的《女阁人》、玛丽·戴利的《女性生态学: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也从不同角度出发纷纷将矛头对准了父权制,指出父权制通过性、政治、文化等“帮凶”合理化男人对女人的支配与压迫。常规的政治理论将性别关系视为理所当然,是“自然的”,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却从父权制概念出发将性别关系视为男权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以父权制为批判基点的既丰富又生动的理论图景。该理论认为,从纯粹的个人“私域”到非个人的“公域”、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从社会到家庭、从世俗到宗教,人类生活的每一角落都浸透了父权制的压迫。在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父权制已完全不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中若隐若现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了,亦不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与阶级分析理论的双峰对峙或水乳交融,它变成了多元而丰满的概念,被赋予了多重身份和意义,甚至万能的解释功能。无论何种领域中的女性受压迫现象都可以在某类父权制度中找到根源。许多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都指出,父权制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之中,而不论其为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因此,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借用“父权制”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与根据国籍、社会阶级、人种或种族等标准进行的划分相比,性别划分更深刻,也更有政治意义。

2. 突出性别批判,明确区分性别自由与性别平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分析的核心概念是“父权制”,它将分析聚焦于妇女所受压迫和剥削的整体性。与此同时,这种整体性恰如其分地凸显了性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的压迫来自于父权制,而父权制建立在性别的男女二分基础上。虽然父权制乐于用生物学来揭示男女不同的性别特征,但是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强调:问题不仅在于性别的二元区分以及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还在于父权制特征赋予男性特征以更高的价值。比如说男人更有理性,其思维更有逻辑,而女人的思维则被认为更诉诸情感和直觉,因此男人应该成为领导者和支配者。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裂是所有社会分裂最深刻、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种,因此,性别是由父权制强加的一个“政治”类别,是由一个主要通过家庭来发挥作用的调节过程再生产出来的。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性别扮演的角色与社会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同,因此“姐妹关系”就相当于“阶级意识”。父权制批判日渐被置换为男权制批判,男人被置于靶心的位置,广受

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的重重责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女性的集会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位女性高声问与会女性: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齐声回答:男人!”^[1]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主要是生理上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统治源于异性恋制度,异性恋制度又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生物学的假设、家庭、社会、宗教等渠道建立起来,使男人得以在肉体上、思想上和文化上征服女性。“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些社会制度不可能被改造,必须连根铲除;不仅要摧毁这些法律和政治结构,也要摧毁它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包括家庭、社会和学校这些产生社会性别偏见的场所,认为这些场所是训练社会成员形成某些偏见和贬低妇女的机制。”^[6]

3. 转向非改良的生物革命策略。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力求区别于以往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它力主革命而非改良,发展为基于本质主义的、火药味十足的女权主义流派。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生理性别差异造成的,并将女性的低下地位归咎于女性的生理结构。她们认为,妇女并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受压迫,而是在任何经济、社会制度中都发生着压迫妇女的现象,那么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只能是妇女的生理结构。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妇女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妇女的生育,如怀孕、生育、带孩子等。因此,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妇女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妇女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妇女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她们认为,要铲除性别压迫,必须首先铲除其生理基础;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费尔斯通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性的辩证法:为男女平权辩护》被誉为对妇女受压迫进行系统分析并解释其根源的最早尝试之一。费尔斯通在该书中强调,

生育机制以及男性对性生活和生育的控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她同意波伏娃关于男女两性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的观点,并认为两性权利的不平等主要是妇女的生育功能所致。她认为,基于生理性别的差异,男女在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性别压迫的产生,也提供了基于生理特征的等级歧视制度范式。因此,“她提出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机制,用技术改造生育机制,使生育得以在女体外进行,使女性从这一生理角色当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妇女对男人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妇女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7]。

(二)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特征

1. 它是激进的。正如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者费尔斯通所指出的,性别冲突是人类最基本的冲突,是所有其他冲突(包括阶级冲突)的根源。

2. 它是革新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不像其他女权主义具有已经由男人发展了几十年的理论基础,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它反对将女权主义理论建立于由男性发展的男性经验和世界观基础之上。

3. 它是反叛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承认男性和女性本质上是有差别的,男女拥有的风格和文化不同,而女性的风格必须成为任何未来社会的基础。

4. 它是张扬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自身的理论必须建立在女性的经验之上,由女性来发展。显然,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批评者,它摒弃了传统的男性范式,张扬女性的美德。

三、对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评价

(一)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局限

第一,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冲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框架局限,走出了以阶级、阶层划分社会结构的旧体系,将男女间的权力差距树立为权力问题的中心,对男性中心社会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这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不能企及的。但是,它也无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两性共同创造的历史,

虽然这一历史主要反映了男性的绝对主导,但女性的价值也同样存在于这一历史中。如果将两性绝对对立,实际上也就由女性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存在基础。而且,现存社会的权力体系是相当复杂的,男女间的权力差距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却不可能在历史上每个时期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第二,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妇女受奴役的根源,揭示了社会权力系统有着更深层次的妇女剥削机制,使广大女性更清楚地认识到受压迫的严重程度以及自我解放的困难性。但她们所指的父权制只是一系列特征和现象的描述,而没有揭示父权制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机制,也就不能为结束父权制找到可行之路。例如费尔斯通认为通过科技的发展,采取避孕、堕胎、试管婴儿生殖、协议养育等方式可以解决妇女的生物角色,并假设这将伴随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而爆发,预言妇女的这一革命将是人类革命的终结。“但费尔斯通没有说明何时会发生这种革命爆发,怎样才能促使这种革命发生,怎样组织这种革命等问题,也没能解决生育、养育儿童这类生理和社会问题。”^[8]

第三,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建立了两性之间更为明确的对立关系划分,使广大女性更准确地把握如何去探索父权制社会的一切现象背后的性别压迫内涵。但同时这种思维前提是反男性的,将男性作为整个女性集团的假想敌人,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它所主张的很多女性解放途径都是与现实生活中男女相互依存的人类本性相背离的。在逻辑上只能导致两性分离和同性恋分离主义,这是不为男性也不为女性所认可的。它对男性的敌对思维带来了对几个世纪男人错误的夸大,把女性视为单纯受害者,却忽视了基本的一点:女性也是历史缔造者和历史与未来的主人。而且,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既存在男性在政治、经济、家务劳动、性等方面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也存在两性之间基于感情、爱、价值以及其他本性之上的平等关系。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存社会的事实考察,两性之间绝不是纯粹的敌人,而更应该是既有矛盾

又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是辩证的思维。仅靠对“女性价值”的赞美和对“男性化”观念的贬损,只不过是建立一种倒转的父权制形式。

第四,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希望通过超阶级的姐妹情谊联合来争取解放,抹杀了女性群体内的阶级、民族、种族等现实差异,无异于另一个“理想国式”的思考,与历史和现实都是不符的。而且,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所指的“女性”并不包括所有的女性,虽然它也声称姐妹情谊可以超越阶级和阶层、种族和国度,但是其理论主要建立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并非全体女性的历史事实再现,其反映的大多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这一点曾遭到女权主义者内部的强烈指责,认为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意愿凌驾于工人阶级、黑人和第三世界妇女的意志之上,不但没有反映后者的需要,还有为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作俵之嫌。

第五,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将私生活纳入政治权力领域进行考察,开创了女权主义思想的先河,更精确地描绘了父权制的无所不在。但是,它将私生活领域的很多问题扩大化、偏激化,将两性之间的家庭生活描绘成没有任何真情的冷酷场所,否定了家庭的建立和维持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感情基础的事实。因此,它所提出的一些家庭关系革命主张导致了一些不可挽回的现实错误。“有不少人深刻反思当年的激进行为,甚至忏悔对丈夫和子女的未尽义务。正是由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有过激之处,如今女权主义才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词汇,不仅男性反感或敬而远之,许多女性也回避这个曾使妇女感到骄傲的词。”^[9]

综上所述,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了双重的效果。从理论上讲,一方面它突破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空间,把女性从男性社会独立出来,与其他受压迫阶层相区别而形成为一个特殊群体或阶层;也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受压迫的论断,寻找出深层次的父权制基础及相关体系。但另一方面,它的激进与理想

化色彩使这一理论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并不为社会甚至女性本身所认可,某些方面连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内部都存在激烈的争论。从实践上讲,一方面,它取得了诸如避孕权等权利以及其他权利的部分完善,但更主要的一面,却是它在现实中遭遇了妇女特别是中低阶层妇女的冷落,也不为其他左派组织所协助,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阻力,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二) 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的现实意义

本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阵营的西方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受制于资产阶级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潮流的阶级本性以及资产阶级批判的固有局限,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它往往被认为专门挑拨女人仇视男人而背负骂名,口碑不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运动遭到广泛的非难,该派内部也出现了自我反思的动向,具体到其现实意义而言,更是大打折扣。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运用证伪方法,以女性客观的历史存在和女性主体体验,对以往所有被认作公理的政治传统说“NO”。“证伪方法,是从现代自然科学中借用或转称过来的,它试图用科学的解说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伪科学成为真理。”^[10]激进主义女权主义揭露和驳斥了社会中普遍存在并被一般政治思想所忽视的性别歧视现象。尽管实践上

的遭遇是步履维艰,但包括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在内的女权主义名副其实地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51.
- [2] M. Barrett, Anne Phillips. *Destabilizing Theories: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M]. Cambridge: Politics Press, 1992. 120.
- [3] 肖巍. 女性主义伦理学[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11.
- [4]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艾晓明, 等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68-89.
- [5] 凯特·米利特. 性的政治[M]. 钟良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39.
- [6] 肖巍.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8.
- [7] 贾格尔. 女权主义理论概览[J]. 国外社会学, 1989, (1): 53-58.
- [8]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局, 1998. 283.
- [9] 刘军. “妇女领域”研究述评[J]. 史学理论研究, 1999, (2): 112-120.
- [10] 李小江. 女人的出路: 致20世纪下半叶中国妇女[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145.

Rebellious and Radical: On Western Radical Feminism

YU Yong-yue, QIN Li-p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econd wave of feminism, western radical feminism turned to the more irrational and revolutionary views and actions based on the liberal feminism that rebels the fake equality between man and woman and reflects on the root of woman's being oppressed. No doubt it has made a name for western radical feminism, but it also brought controversies. Western radical feminism has remained a school of controversies since its birth, and its ontological views induce increasing criticisms. Thu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analyze western radical feminism scientifically, in hope of some revelation for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Key words: western radical feminism; patriarchy; gender criticism; biological revolution

(责任编辑 鲁玉玲)